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国际发展研究进展

CURRENT ISSU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2年9月 第4期 (总第4期)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Studies on China's Foreign Aid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s

廖兰 刘靖

LIAO LAN LIU JING

干预还是自主?

——对受援国发展援助自主性问题的研究综述

Intervention or Independence?

——Literature Review on Ownershi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n Development Aid

赵越 周圣坤

ZHAO YUE ZHOU SHENGKUN

国际发展援助可持续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王伊欢 赵杰

WANG YIHUAN ZHAO JIE



编者按

自二战以来，作为一种制度创新，国际发展正日益成为与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政治与安全并驾齐驱的一个重要概念，成为全球治理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国际发展干预为载体，从概念、政策到手段，从制度、机构到人员，已形成一套制度化的系统框架。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影响力的逐日扩增，及其在对外交流与合作理念、方式上的独特性，西方发达国家不断给中国施加压力，希望将中国纳入现行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体的国际发展援助体系。面对上述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更好地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建议，同时提高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的对话能力和影响力，是当今中国国际发展研究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在历经六十多年的摸索之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发展研究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失败案例，并形成一系列制度化的框架，这些经验、教训及框架成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国际发展研究中不可忽视的资源。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发展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发展咨询，90年代的发展研究与教育，一直到进入新世纪后设立的中国第一个国际发展教育项目，我们创立了国内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系统的从本科到博士，针对国内学生到涵盖国际学生的国际发展研究的教育、研究、与咨询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尝试结合中国的发展实践探索具有中国视角的国际发展研究途径，另一方面，我们与国际发展研究学界保持密切的对话和沟通，积极参与国际发展框架内前沿的相关讨论。

我们的国际发展研究从基本资料的收集开始，近期主要集中介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援助委员会在不同阶段所通过的三个宣言，作为国际发展规范、规则和共同目标的一部分，它们体现了发达国家在开展国际发展集体行动中的一种集体性程序。为进一步加深对这些基本概念、基本数据和基本观点的理解，我们也将附上国际著名专家在相关方面的前沿性论文。通过对这些基本概念与管理体的梳理开始，我们逐步呈现国际发展框架下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并以内部资料的形式介绍给大家，供决策者、学者和相关机构参考。

编 者

12年9月5日



目 录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2
1. 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概况介绍.....	3
2. 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效果及影响的评价研究.....	4
3. 中国与现有国际援助格局的关系和未来的展望.....	8
4. 总结.....	10
参考文献.....	10
干预还是自主？——对受援国发展援助自主性问题的研究综述.....	13
引言.....	14
1. 援助自主权问题的缘起.....	14
2. 援助自主权是什么.....	15
3. 对受援国自主权的主张.....	16
4. 援助自主权的背后逻辑与行动启示.....	17
5. 干预还是自主？——对援助自主权发展趋势的讨论.....	19
6. 结语.....	21
参考文献.....	21
国际发展援助可持续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23
1. 援助可持续性的研究概况.....	25
2. 援助可持续性的定义.....	26
3. 援助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	29
4. 可持续性与援助依赖.....	31
5. 提高援助可持续性的建议.....	32
6. 问题与研究展望.....	34
参考文献.....	35
全球国际发展研究机构介绍.....	38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对外援助研究

廖 兰 刘 靖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100193

摘要：伴随着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和影响的扩大，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对外援助这一议题，并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迄今为止的国外学者和发展研究机构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回顾，分析其视角和关注要点，以为国内学者未来的研究提供借鉴。整体而言，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对外援助概况的客观介绍，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评价，以及探讨中国在国际援助体系的作用及与传统援助国的关系与未来。

关键词：中国对外援助 评价 西方视野

Studies on China's Foreign Aid from Western Perspectives

LIAO Lan LIU Jing

Abstract: With the spread of the sum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foreign aid, western scholars have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and have produced a certain number of research output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ed to do a systematic and thorough review on those papers written by foreign scholar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so far, analyze their perspectives and focus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research of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whole, the relevant research by western scholar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aspects: the objectiv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hina's foreign aid, comments on China's foreign aid, and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foreign aid architecture and its current and future 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donors.

Key words: China's foreign aid, comments, western perspective

从二战以后，可以说全球的发展议题一直围绕着“援助”展开。中国作为一个非传统援助国在国际发展舞台上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对外援助的规模和范围显著增加，中国已经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其鲜明的目的、



定位和特点，与以西方援助国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在援助的管理形式和影响效果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引发了国际发展研究机构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并且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因此，对于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介绍，有助于增强国内学界和援助管理机构与国际社会的对话能力，理清未来研究的方向，并为构建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话语体系起到借鉴作用。

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对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整体性介绍；二是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效果和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价；三是探讨以中国为代表的“非传统援助国”与现有的以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占主导地位的国际援助体系的关系和未来的合作之路。

1. 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概况介绍

虽然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但西方学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兴趣始于 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召开之后，中国加大了对非援助力度，在非洲发挥了越来越明显可见的影响之时。尤其是 2006 年第三次中非合作论坛之后，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出现了急速的增长。由于中国对外援助信息披露机制不完善，统计资料不完整，对于中国是如何进行援助的，国外学界知之甚少。因此，最初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公开信息资料的搜集，以及对相关政府和外交工作人员的访谈，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体系进行系统的介绍。

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 Carol Lancaster (2007) 对中国对外援助整体状况的介绍，包括中国援外的金额、动机、决策管理机构及其发展变化；Gregory T. Chin & B. Michael Frolic (2007) 全面介绍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传承及各阶段动机与原则、管理机制与结构、援助方式、援助金额、地区分布及项目类型等，尤其是介绍了中国发展研究机构的现状及国际联系；Martyn Davies(2008)系统介绍了中国对非的援助体系、金额、动机、形式，并以中国在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援助项目为例，研究了中国援非具体形式和项目情况；Thomas Lum(2009)等学者详细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概况，尤其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活动，是为数不多的系统揭示中国对外援助地区分配的文献；Sven Grimm(2011)从援助透明度的角度全面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政策、战略、程序、模式、以及评估等方面的数据获取情况；Sara Lengauer (2011) 分析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结构与组织基础、文化影响、援助方式，以及中国在对外援助五个历史阶段中各自侧重的援助动机。

在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情况进行介绍性研究时，中国对外援助透明度的问题受到了学者的特别关注。尽管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相关的官方文件，新闻媒体报道，以及对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情况基本可以有个比较清



楚的了解，但是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问题，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学界都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于中国对外援助金额不透明的原因有多种解释：Carol Lancaster（2007）指出中国对外援助信息不透明既有客观上援助体系和管理制度本身和能力建设不足的因素，也有主观上出于对国内外压力的考量，还有由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个体系与传统援助国在援助概念和统计口径上的不同造成的统计困难；而 Thomas Lum（2009）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很难计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对外援助概念与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概念差别很大，中国的援助只有很小的比例满足 ODA 的概念，但被认为属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具有援助的性质，因此不同学者对中国援助金额的估计差别很大。而 Sebastian Paulo & Helmut Reisen（2010）也指出，中国的援助金额无法统计的原因是中国的援助分类与西方不同，技术合作、投资与援助混合在一起，在统计年表中并未列出一些技术合作项目的资金类型。而且中国的援助项目名称繁多，造成了统计数据有可能被高估也有可能被低估。Sven Grimm（2011）专门撰文研究了中国援助的透明度问题。他指出中国的援助透明度很低，是中国对外援助饱受批评的一个方面。导致中国对外援助不透明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中国文化和哲学方面的因素。他在系统搜集和整理了中国对外援助的相关信息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对外援助信息的透明度不如传统援助国，但比人们想象的要多；而且中国正在加快信息公布的步伐，近年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Axel Dreher & Andreas Fuchs(2011)进一步指出根据他们的实地研究和统计数据，中国提高对外援助数据的透明度有助于打消很多国际社会对其援助方式、动机和效果的抹黑和质疑，对中国自身是有利的。

由上述可见，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整体概况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非常全面系统的介绍，对于其不同于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援助管理组织形式、历史发展、援助方式以及动机分析等相关的资料与数据都已经有了清晰的呈现。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进一步发展到对中国对外援助的影响和效果的分析上。

2. 中国对外援助方式、效果及影响的评价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效果及影响的评价从不同视角呈现出不同的关注点和迥异的结论。整体而言，分为批评质疑，友好辩护和积极评价三种不同立场。

有部分学者对中国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持批判和否定态度。Thomas Lum（2009）指出中国对外援助相对于其援助金额而言获得了“不成比例的赞赏和关注”。Moises Naim（2007）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本质上不民主，实践上不透明”，其动机是完全自利而非有利于受援国，其结果“对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构成威胁，并



会创造一个更加腐败，嘈杂和独裁的世界”。概括而言，西方学者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批评和质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对外援助不要求善治，增加了腐败的可能。中国提供无政治条款的援助给西方传统援助国带来了挑战和压力，导致受援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必要改革被延迟甚至取消（Manning, 2006; Elling N. Tjønneland, 2006 ; Machiko Nissanke, 2010）；无附加条件使得受援国民主进程受损，对受援国有深层的消极影响，而“不干涉内政政策”促进了受援国的腐败和滥权政府（Jonathan Weston 等, 2011）；中国援助那些其他援助机构避免或可以不给予援助的地区，如支持西方不愿意支持的“流氓国家”苏丹（Thomas Lum, 2009）；而中国对受援国的自然资源的攫取，可能导致资源丰富的穷国患上资源依赖症，并引发相应的腐败（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 2010）；

第二，中国对外援助的不透明性导致不公平的国际竞争。Émmanuel Guérin（2008）指出中国目前仍然保持援助的混合性，机构也分散多元，主权贷款方面的数据保持神秘。这种竞标的不公开性和捆绑援助，提供了不公平的国际竞争条件（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 2010）。中国补贴其国有企业打开国外市场，导致中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Jonathan Weston 等, 2011）。

第三，恶化受援国债务状况，影响其债务可持续性（Manning, 2006）。中国逐渐成为“新的”非洲最大的债权国，中国的搭便车行为（free-riding）破坏了国际社会布置的发展战略同时削弱了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Elling N. Tjønneland, 2006）。

最后，中国的对外援助目的是攫取自然资源，结果导致破坏当地环境，且援助项目的工作环境恶劣。中国的对外援助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安全事故多发，建筑质量堪忧（Jonathan Weston 等, 2011）。Machiko Nissanke（2010）也认为西方对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担心主要集中于其在环境和安全方面的不良记录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攫取。

整体而言，他们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的动机是自私自利而非为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中国的援助方式不遵循西方社会已取得共识的援助规则，影响了援助的效果，破坏了传统援助国在提高援助有效性上的努力。

但与此同时，有一大批学者针对上述对中国援助所进行的批评，进行了一一回应和辩护。

针对指责中国无条件地支持一些“流氓政权”，有学者认为事实上通过中国在苏丹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在苏丹的人权保护和结束战乱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而并没有进一步加强独裁和不民主，（Ngaire Woods, 2008; Sara Lengauer, 2011）。



中国对传统援助国认为很难开展援助的脆弱国家进行援助，填补了传统援助国留下的空白地带，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上（Arjan De Haan, 2010），如果不援助这些国家，情况将会更糟（Sara Lengauer, 2011）。

有关中国的援助恶化了受援国债务可持续性的回应上，Ngaire Woods（2008）指出，截止 2007 年，中国已经免除了 44 个国家的 21.3 亿美元的债务，中国还在持续将无息贷款转换成赠款，因此针对中国恶化受援国债务状况的指责是没有根据的。相反，不少大量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率提高、贸易条件改善、出口增加和公共财政收入增加的良好状况（Reisen, 2006）。

关于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削弱了西方援助国在要求善治、民主改革和治理腐败方面的努力成果，对传统援助提供国产生了“挤出效应”的指责。有学者回应：首先，中国在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不逊色于任何其他援助国，也没有数据表明中国的援助在民主和治理上不如其他国家（Axel Dreher&Andreas Fuchs, 2011）。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因此并不反对他国走民主化道路（Sara Lengauer, 2011）。DAC 在促进受援国治理改善方面的成效乏善可陈，西方支持下的民主制成功的案例并不多，很多甚至变得更加混乱。既然没有改善，也就谈不上新兴援助国的威胁（Ngaire Woods, 2008; Sara Lengauer, 2011）。其次，没有发现中国的援助更加倾向于独裁或腐败的政权（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 2010）。中国对外援助项目由中国控制，资金被直接用于项目，因此不会滋长腐败（Sara Lengauer, 2011），如果中国和其他国家被控诉助长了非洲的暴君，鼓励腐败，这就不得不承认非洲本身有太多的暴君与腐败（Deborah Brautigam, 2010）。

其他方面的一些辩护还有：在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存在环境破坏、工作环境恶劣等情况的回应中，认为中国国内的标准本身就低，并不存在国内外标准不一致的情况，提高工作环境受援方也有责任（Ngaire Woods, 2008）。Jin Sato（2011）认为中国援助项目的交易成本和执行成本低，且决策和执行迅速。Sara Lengauer（2011）认为中国项目雇佣本国工人的同时也雇佣了大量当地劳动力，而且对于有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雇佣中国的工人是因为他们技术更高，是项目需求所致。

可以看出，无论是质疑还是辩护，以上学者的评论基本都是站在传统援助国的角度，运用已有的规则和话语体系，着眼于讨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符合传统援助国已经建立起的一套标准来衡量其作用和效果。而有另外一些学者却已经开始尝试跳出这一套话语体系，关注和分析中国对外援助自身的特点及其对受援国和整个国际援助体系的影响来评价其独特的作用。不少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介入国际援助发挥了其特殊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所采用的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形式，为受援国以对等的姿态取得共赢开辟了新的道路。不少学者认为相比单纯的发展援



助，中国的对外援助所采用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合作，是建立互惠共赢的全面伙伴关系，这更具吸引力且为受援助国提供了平等对话的新选择。

首先，中国与非洲建立的是一种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经济合作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强调目前中非之间的整体合作（J. Peter Pham 2006），从不使用“减贫”或者“贫穷”这样的表述（肯尼思·金，2006）。中国认为诸如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增长对于减贫才是最重要的（Kenneth King, 2006），而非“千年发展计划”目标中的社会性指标（Kenneth King, 2006）。中国获得了资源、商业机会和外交主动权，而非洲也得到了援助，双方均从中获益（Yawei Liu, Linling Zhong, Tyler Thompson, 2011）。

其次，除经济领域外，中国对于受援国的基础设施、教育领域的重视以及农业项目的援助，使得其援助聚焦于受援国的实际需求，对受援国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影响（Paulopoku-mensah, 2009; Jin Sato, 2011; Nordtvei, 2012）。Anita Spring（2012）指出随着中国农业国有企业、私有企业以及个体老板、家庭进入非洲，从中非农业合作与贸易中获得了利益，并为非洲带来了发展机遇。

第三，中国尊重受援国自身的主权和发展路径以及意识形态的选择，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且中国以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倡导南南合作，在实践中运用贸易伙伴、投资、技术提供者、信贷和发展援助者的身份增强了自身的吸引力（Elling N. Tjønneland, 2006）。相比传统的援助国把善治和人权问题作为指导原则（Delphine Lecoutre, 2008），中国并不要求受援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给出援助（Paulopoku-mensah, 2009），没有证据表明，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方式是更加有效的（Kwesi Aning, Delphine Lecoutre, 2008）。中国做为一个接受大量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与其受援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发展中国家可能更愿意听中国的意见。中国对外援助的不同模式、项目设计和监管也使得中国的援助比其他国家更加有效（Axel Dreher & Andreas Fuchs, 2011）。因此，大多数受援国认为中国是一个“善意的有建设性的伙伴”，中国对外援助在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如柬埔寨等地都受到欢迎（Sara Lengauer, 2011; Jin Sato, 2011）。

最后，中国的加入，增加了受援国在国际援助体系中的话语权，改变了原来传统援助国一支独大的局面，给了受援国更多的选择（Paul Opoku-mensah, 2009）。Emma Mawdsley（2011）从“礼物理论”（gift theory）的视角出发，认为国际发展中的“援助”可被视为“礼物”，西方援助被视为“消极给与”，不求任何“交换”，这种方式往往使接受者一方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容易形成援助依赖。而中国利用传统的第三世界的概念和长期的政治联系来与发展中国家展开更多的交流合作，使得援助接受者享受平等和尊严（Elling N. Tjønneland, 2006）。



从上述讨论可见，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效果和影响的评价已经有了大量研究成果。有部分学者从西方援助的视角看待中国的对外援助，会产生一些误解和非议，但从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方式和影响的讨论，基本还是比较客观和理性的，无论是从统计数据的分析还是实践访谈的结果，都证实了中国的对外援助并不像传统援助国以为的那样存在诸多方面的“恶劣影响”，相反，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提高援助有效性和建立新的援助模式和双方关系上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 中国与现有国际援助格局的关系和未来的展望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提供者的地位已经被西方学者所一致认同。但是由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者”无论在援助理念或历史发展，还是援助模式等方面与以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为主的国际援助机构的理念有着诸多差异，那么中国与传统援助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未来如何并存或合作，成为了近年来西方国际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主题。

对于中国在国际援助版图中的地位，西方学界的观点比较一致：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从援助金额来说，目前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的金额相差甚远，不会动摇或取代传统援助国在国际援助版图中的主导地位（Manning 2006; Ngaire Woods 2008; Paul Opoku-Mensah 2009）；但另一方面中国等新兴援助国的地位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和明显，已经成为国际援助中不可忽视的行动者（Manning, 2006; Ngaire Woods, 2008），对现有的国际援助体系形成了挑战（Paul Opoku-Mensah, 2009），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正在发生。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出现，增强了受援国的话语权和选择权，从而激发了健康的竞争（Jin Sato, 2011）。同时，逼迫传统受援国反思自己或过时或无效或过于不切实际的援助条件（Ngaire Woods, 2008）。

中国的对外援助与以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又有许多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构成了双方合作的基础，而差异则意味着合作并非短时间就可以达成的，两者的融合或合作需要漫长的时间去探索。

双方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援助过程中与受援国的关系及援助目的定位不同：西方对于援助双方的关系定位是“北方富国对南方穷国”，目的是“减贫”；而中国则是“南南合作，穷国对穷国”，目的是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Paul Opoku-Mensah, 2009）；2）援助形式和主体的不同：西方国家的援助形式有双边，多边以及非政府组织，同时有相关的咨询公司和发展机构作为支持系统，而中国的



援助形式只有双边，且没有任何相关支持系统（Paul Opoku-Mensah, 2009）；3）关于援助的原则，中国主张不附加政治条件，而欧盟以条件性，单边捐助和共同责任为原则；4）关于援助的优先次序和方式，中国提出更加注重经济基础设施的发展，把优惠贷款作为主要工具；而欧盟强调社会基础设施的发展，尤其是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作为其主要资助的手段（Jin Ling, 2010）。

而 Arjan De Haan(2010)指出中国的对外援助与传统援助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强调“合作”而不是“援助”，这与传统援助国对援助目的和本质的争论是一致的；不干涉内政的政策与传统援助国所强调的受援国“自主性”相似。此外，两者有共同的团结和放眼长效的价值观，且都有对援助效果进行监测和评估的潜在需求（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 2010）。

有学者建议 DAC 成员国应积极寻求与新兴援助国的对话和交流，将中国在内的新兴援助国尽早纳入现有的国际援助体系中来（Manning, 2006），使用彼此优势影响力来配合以此来实现双方的战略目标并同时改善非洲的境况。Philippe D. Rogers（2007）认为对于美国最明智的做法是合作而不是竞争，“不是憎恨、敌对而是创造性地融入非洲和中国”（J. Peter Pham, 2006）。

但如 Carol Lancaster（2007）所观察到的，中国政府并不愿意加入现有的 DAC 体系成为“富国俱乐部”的一员，而是将自己定位于“南南合作”中与受援国平等合作的一方。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2010)也觉察到中国对于遵循经合组织的规则态度谨慎。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不足，如以家长式干涉受援国内政、将高度一致的发展模式应用于所有受援国的理念和其援助缺乏有效性（Paul Opoku-Mensah, 2009），以及 DAC 内部的协调欠佳，使得中国加入现有国际援助体系动力不足。而 James Reilly（2011）通过对中国在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实地调查发现中国可能并不仅仅想做一个规则的“遵循者”，而有可能试图做一个规则的“创立者”。因此期望将中国在内的新兴援助国简单纳入现有的体制并不可行（Ngair Woods, 2008）。如 Sebastian Paulo and Helmut Reisen(2010)所指出的那样，未来的国际援助格局可能会朝着两者互相学习，在保留现有体系中有效和积极的方法的基础上，未来国际援助格局的发展方向可能会是两者互相学习，在保留现有体系中有效和积极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援助者的新方法，改进为全新的更加包容的援助格局。Jin Ling（2010）强调，欧盟和中国双方应撇开“竞争模式”的看法，研究共通点，为合作打开新的窗口，同时考虑到双方之间存在差距，采取务实的方式推进合作。

Paul Opoku-Mensah(2009) 指出，真正的焦点应该放在“重新思考援助以及援助体系的根本目的”上来，转向更多的考虑非洲人的利益（Denis M. Tull, 2008）。从这



个意义上说，中国 and 传统援助者不应是一种竞争关系，而是朝着如何更加有效地发挥援助效果，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伙伴合作关系。毕竟，对于发挥国际援助有效性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援助的多种提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充分利用新的资金来源和新的理念（Felix Zimmermann & Kimberly Smith 2011）。因此，从接受援助的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思考和建构未来国际援助新的格局才是确保这一体系真正发挥作用的正确思路。

4. 总结

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聚焦和关注不到十年的时间，在搜集和整理相关客观资料和信息的基础研究之后，已经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大部分仍旧沿用当前国际援助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援助国对外援助的话语体系，通过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差异，中国的援助是否符合传统援助国对于援助有效性相关原则的讨论作为研究的基础，而真正从受援国视角的研究相对不足。目前为止，相关研究的学科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等方面，而从国际发展的学科视角来研究的文献还相对较少。在研究区域上，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对非援助的研究，而对拉丁美洲和东中亚的援助研究并不多。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无论从文献数量还是研究视角来说，并不充分或深入，并缺少系统的理论体系。关于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还处于初步的起始阶段，但随着未来中国在国际援助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更多相关的议题必将会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参考文献

- [1] Achberger, Jissica. (2010). "The Dragon Has not Just Arrived: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frica's Relations with China" *History Compass* 8/5(2010):368-76. Print
- [2] Ali Zafar. (2007). The Grow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ub-Saharan Africa: Macroeconomic, Trade, Investment, and Aid Links. *World Bank Res Obs* (2007) 22 (1): 103-130. Web. April 20
- [3] Arjan De Haan (2010). Will China chang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 we know i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 Int.Dev. 2010
- [4] Brautigam, Deborah. (2010). China,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Architecture unpublished book. 2010
- [5] Brautigam, Deborah. (2010). "Book Report: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Journal of Washington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Summer 2010, vol.5, No1:65-69.
- [6] Chin Gregory T and Frolic B Michael. (2007). Emerging dono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he china case. IDRC/CDRI, Canada



- [7] Davis Martyn (2008) . How china deliver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Africa. A research undertaking b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prepared for DFID.
- [8] Dreher Axel and Andreas Fuchs. (2011). Rogue Aid?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Aid allocation. JEL classification:F35
- [9] Elling N. Tjønneland. (2006). China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Norwegian Foreign and Development Policies. Chr.MichelsenInstitute CMI Reports .2006: 15
- [10] ÉmmanuelGuérin. (2008). Chinese assistance to Africa: characterization and position regard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of development aid. GLOBAL GOVERNANCE.N03 .2008
- [11] Grimm Sven, with Rachel Rank, Matthew McDonalds and Elizabeth Schickerling. (2011).Transparency of Chinese aid- an analysis of the published information on Chinese external financial flows.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
- [12] HanyBesada, Yang Wang, JohnWhalley. (2008).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activity in africa.NBER Working Paper No. 14024. May 2008
- [13] Helmut Reisen. (2007). Is China Actually Helping Improve Debt sustainability in Africa? Par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6-7July.2007
- [14] Holslag,Jonathan. (2006). "China's New Mercantilism in Central Africa"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Vol5,No2 2006:133-69.
- [15] Jin Ling. (2010). Aid to Africa: What can the EU and China Learn from Each Other?Saiaaoccasionalpaperthe china in Africa project.march 2010
- [16] Kenneth King. (2006). Aid within the Wider China-Africa Partnership: A view from the Beijing Summit. Paper to Workshop on China-Africa Links.11-12 Nov. 2006.
- [17] Kenneth King. (2007). China's Aid to Africa: A View from China and Japan. Tokyo: Lead paper to the JICA seminar on 'China's Aid to Africa – the Beijing Summit and its Follow-up'. 29 Jan. 2007
- [18] Kragelund, Peter. (2011). "Back to BASICS?TheRejuvenationof Non-traditional Donors'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Afric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2(2)2011:586-607.
- [19] Lancaster Carol. (2007). The Chinese aid system.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USA.
- [20] NYU Wagner School (2008). Understanding Chinese foreign aid: a look at china's development assistance to Africa,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April 25, 2008.
- [21] Lengauer Sara. (2011). China's foreign aid policy: motive and method. Culture Mandala: bulletin of the center for east-west cultural &economic studies, vol.9, issue 2, September-December 2011: 35-81
- [22] LumThomas, Hannah Fischer, Julissa Gomez-Granger and Anne Leland. (2009). China's Foreign Aid Activities in Africa, Latin 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0361.
- [23] Machiko Nissanke. (2010). The Changing Landscape in Aid Relationships in Africa: Can China's engagement make a difference to African development? London: Workshop on TICA Initiative. 12. Oct. 2010
- [24] Manning Richard. (2006). Will "Emerging" donors challenge the fa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4(4):371-383
- [25] Mawdsley Emma. (2011).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 from gift the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17



- [26] Naim Moises. (2007). Rogue aid. *Foreign policy* 159:95-96
- [27] Nordtveit, Bjarn H. (2010). An Emerging Donor i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China in Cameroon <http://dx.doi.org/10.1016/j.ijedudev.2010.01.004> (accessed 25 Feb. 2012).
- [28] Opoku-mensah, Paul. (2009).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aid syste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o.141). Aalborg: DIR & Development of history, international and Social Studies Aalborg University.
- [29] Paulo Sebastian & Reisen Helmut. (2010). Eastern donors and western soft law: towards a DAC donor peer review of China and India?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8(5): 535-552
- [30] Penny Davies. (2007). China and the end of poverty in Africa towards mutual benefit? Diakonia. 9 Dec. 2007
- [31] Pham, J. Peter. (2006). "China's African Strate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006:(28) 239-53. Print
- [32] Power, Marcus. (2011). "Angola 2025: The Future of the "World's Richest Poor Country" as seen through a Chinese Rear-View Mirror" *Antipode* Vol.00No.0 2011:1-26. print
- [33] Reilly James. (2011). A norm-taker or a norm-maker? Chinese aid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2), 21(73), January 71-91
- [34] Richard, Schiere, Walkerhorst Peter. (2010). "Introduction: China's Increasing Engagement in Africa: Towards Stronger Trade,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frican Development Review* Vol 22 NO. S1. 2010:559-61. Print
- [35] Rogers, Philippe D. (2007). "Dragon with a Heart of Darkness? Counting Chinese Influence in Africa" *JFQ/ISSUE* 47. 4th quarter 2007
- [36] SATO Jin, Hiroaki SHIGA, Takaaki KOBAYASHI and Hisahiro KONDOH. (2011). Paper prepared for the 12th annual conference of GDN in Bogota, Columbia, January 15, 2011
- [37] Spring, Anita. "Chinese Development Aid and Agribusiness Entrepreneurs in Africa" repositioning African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 [38] Tan-Mullins, May, Giles Mohan, Marcus Power. (2010). "Redefine 'Aid' in the China-Africa Contex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1(5) 2010:857-81.
- [39] Tull, Denis M. (2008) "China in Africa: European Perceptions and Responses to the Chinese Challenge" Working Paper in Africa Studies of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8
- [40] Weston Jonathan, Campbell Caitlin and Koleski Katherine. (2011). China's foreign assistance in review: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Staff Research Backgrounder.
- [41] Woods Ngaire. (2008). Whose aid? Whose influence? China, emerging donors and the silent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84(6): 1205-1221
- [42] Yawei Liu, Linling Zhong and Tyler Thompson. (2011). Assistanc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a's Aid Program in Africa and its Consequences. Singapore: China's Role in Global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10-11. March. 2011
- [43] 肯尼思·金. 中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 北京: 国际政治研究. 2006:04



干预还是自主？

——对受援国发展援助自主性问题的研究综述

赵 越 周圣坤

摘要： 在国际发展援助中，援助国的外部干预与受援国的内部自主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此强彼弱、不断博弈的关系。在全球普遍出现的政府主导发展转向市场主导和私有化、公民社会组织逐渐兴起、第三世界国家地位提高的发展背景之下，关于受援国自主性的讨论日益增加。本文对受援国在发展援助中自主性问题的研究主要分为四部分：1、援助自主性问题的缘起及涵义；2、现有对援助自主性的观点主张；3、援助自主性的背后逻辑与行动启示；4、对援助自主性发展趋势的讨论。

关键词： 援助自主性 外部干预 巴黎宣言 援助依赖

Intervention or Independence?

——Literature Review on Ownershi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n Development Aid

ZHAO Yue ZHOU Shengkun

Abstract: There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tervention from donors and ownership of recipients during the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aid. Discussion about ownership of recipient countries is increas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from government to market, the emergence of CSO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stronger all over the world. This article mainly includes four parts: 1. The origin of ownership issue; 2. Viewpoints on ownership; 3. Logic of aid ownership and action guidance; 4. Discussion about developmental tendency of aid ownership.

Key Words: Aid Ownership, External Intervention, Paris Declaration, Aid Dependence



引言

在国际发展援助中往往存在一对矛盾。一方面，援助国在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粮食援助、资金援助、技术援助等援助的过程中，期望通过自己的干预和强制力帮助受援国克服困难。在受援国缺乏先进的管理及技术的情况下，援助国对援助的操控能够使受援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发展；但另一方面，援助国有足够的实力来掌握援助各个环节的同时，也使得援助国被动地参与援助过程，在援助中的主体地位被忽视。外部干预和内部主事权之间处于一种此强彼弱、不断博弈的状态。随着国际援助的不断发展和改革，也随着学界和政治家对于发展援助效果的反思，援助中的所有权或自主性¹问题（ownership）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

1. 援助自主权问题的缘起

在一系列的全球普遍出现的发展背景（如政府主导发展转向市场主导和私有化；公民社会拥有游说实力，对发展干预表达不满）下，国际援助中受援国的自主权、参与性，援助不同主体之间伙伴关系进入研究视野（Fowler, 2000）。

自主权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几十年来国际发展援助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同时也不乏大量失败的例子（Dollar & Pritchett, 1998）。在此期间的发展援助都是援助国主导的以强硬的政策为主，（Browne, 2006; Birdsall, 2005）。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援助无效论甚至是援助有害论已然成为一种共识，（Van de Walle, 2005）。Dollar and Pritchett 发现援助无法保证受援国的国内改革的实行，援助国逐渐意识到若缺乏受援国强大的政治支持（可理解为“国家自主权”），援助即为无效的（Dollar and Pritchett, 1998）。

巴黎宣言中要求受援国在国家发展过程及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发挥其主导权，以及协调好各种援助活动之间的关系。宣言要求援助国尊重其援助伙伴的国家主导权，并帮助他们加强治理能力建设。（OECD-DAC2005:3）。在援助过程中，受援国的议会、地方政府、公民社会及广大公民都未参与到其中，因此阿克拉行动议程中特别说明，援助国应支持受援国家参与主体的能力建设，参与主体包括上述的议会、中央及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组织（CSO），另外还有研究机构，媒体及私人部门。由此可见，从巴黎宣言首次界定发展援助中的自主权，到阿克拉行动议程中通过加强受援国参与主体的能力建设，伴随着对援助效果的争论，对援助自主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加大，其研究的范围也逐步扩大。

¹ 对应的是英文资料中的“ownership”，中文资料中有不同译法。本文借鉴对巴黎宣言的官方翻译以及不同的语境，文中多使用“主权”、“所有权”、“自主权”、“主事权”或“自主性”。



2. 援助自主权是什么

在讨论援助自主权问题时,我们首先应明确其概念所指。对于援助中“ownership”的概念,Deborah Bräutigam 认为,在理论上,它理应与政府实践其发展目标的能力相关,不管是否与当前的发展主流相一致。在实践层面上,“ownership”用于表示一种程度,一种介于援助行动与政治领导之间,国家利益与国家理念之间的契合程度。由于援助行动与国家领导的政治生涯很难协调一致,因此,援助所有权或自主权也一直是受限的(Deborah Bräutigam, 2000)。

Peter De Valk 提出可从四个视角来理解援助自主权:伦理视角;官僚视角;激励视角;理性预期视角。如伦理视角下的援助大多是出于对人权平等的追求,援助方往往“理所当然”地提出对资源、权力、机会等的命令式的要求,这种援助关系本质是不平等的,与人道主义伦理相违背的。本来设想的援受关系是主体-主体关系,然而在这种不平等之下的援受关系则变成主体-客体关系。在强加了条件的援助中,对于受援国的援助所有权、援受双方伙伴关系再冠冕堂皇的讨论,其援助关系实质仍是主体-客体关系。Peter De Valk 在梳理概念时指出,传统意义上的“自主权”都意指对个人的意义。孰不知“自主权”的概念也可运用至一个集体或一个组织。在援助过程中,与那些物质性的投入产出相比,自主性体现出的更是一种责任感(Peter De Valk, 2010)。所有权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概念。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它,但是所有权的性质是复杂的,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如既得利益、权力关系、文化、态度及行为等等。在援助和发展中的所有权直接与公平、话语相挂钩。(Philippe Besson, 2009)

斯坦福大学的学者在一项研究中指出,“所有权”时常被援助国用来形容援助政策中的责任,然而这种政策是如何做出的就不得而知了。援助行动机构在制定执行政策时经常以援助自主权当作幌子,一旦出现不同政见,他们便会拿出援助自主权这个借口当挡箭牌。因此,援助自主权常常与政治控制密不可分(Paolo de Renzio, etc, 2008)。

巴黎宣言中正式将“ownership”定义为受援国对于其发展过程的领导权及决定权。然而,2008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改进巴黎宣言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反思巴黎宣言中对援助所有权或自主权的定义。他们认为所有权或自主权是援助有效性体系中的最基础的环节,是保障援助实效的根本性的条件之一。而巴黎宣言中对所有权或自主权的定义仅局限在有关援助国及受援国双方政府的自主权,被作为评估对方援助实施战略的一项指标。巴黎宣言中对“相互责任”的表达局限于援受双方政府的责任,排除了其他的所有权主体,因而可能会对国内民主所有权体制产生不利影响。该研讨会将“ownership”的概念进一步阐述为“democratic ownership”,即国内



民主所有权,将公民的话语及关注纳入国内发展规划和发展过程中,使得广大公民不仅对援助资源及信息有充分的知情权和获得权,更要发挥他们在援助实施、监测与评估环节中的作用。只有当全体公民、所有行动主体都共同投入到发展规划与发展管理中,民主所有权才能得以实现。(哥本哈根会议,2008)。

3. 对受援国自主权的主张

自从援助所有权问题被摆上桌面的那天起,各方针对援助所有权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自1993年的第一届到2003年的第三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其会后的宣言中均涉及关于非洲国家发展所有权、自主权的内容。如1991年《东京非洲发展宣言》中强调,“我们庄严通过这一宣言,坚信它将加强建立在非洲国家自力更生的可持续发展与非洲发展伙伴支持基础上的一种新兴伙伴关系。”宣言中出现的“自力更生”和“伙伴关系”两个概念对传统的援助理念产生了冲击;1998年《东京行动计划》中宣布,“主事权(ownership)”与“伙伴关系(partnership)”是行动计划的根本原则。“主事权”从“自力更生”的概念演变而来,指非洲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过程中的自主权,主要体现为“自助”;2003年在《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十周年宣言》中强调“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过程一直提倡非洲国家对自身发展进程的‘主事权’和国际社会支持这种主事权的‘伙伴关系’对非洲发展至关重要”,主张应该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力量与以非洲联盟和“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为代表的非洲主动性相结合(李安山,2007)。

2005年由援助国、受援国与公民社会组织共同签署的《巴黎宣言》中提出了提高援助效率的五个方面。在提高援助效率的五方面关键要素中第一个就提出了对所有权(ownership)的要求及相应指标(巴黎宣言,2005)。之后的阿克拉宣言中重申,无论何时,我们都会遵从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政策情况,并且会继续通过采取建立一套制约相互共识机制、定期制作与公众情况有关的支出等措施来继续改变援助制约性(阿克拉宣言,2008)。

OECD在“Ownership in Practice”非正式专家研讨会上明确了南北合作中的三个原则:(1)发展的主要责任还是落在南方国家自身。在发展研究和政策制定时这条原则应有外力的推动。(2)北方国家应逐渐适应越来越非主流的发展政策,以及更加多元化的国家、市场、贸易、投资的角色,并且还要逐渐接受发展政策中的“失误”。(3)发展合作中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促进南方国家当地的能力建设,重点是在发展研究和政策制定中的能力。这是囊括了制度建设和社会学习的能力建设,必定是个长期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对受援国自主权的主张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方来发出的，即使巴黎宣言与阿克拉议程是由包括援受双方的所有与会国家达成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发达的援助国，鲜有作为受援方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对援助自主权的话语表达。援助国在援助自主权问题上占据了主动，掌握了该领域的话语霸权，在对援助自主权进行主张与阐述时并未或者很少结合受援国的需求与态度。

4. 援助自主权的背后逻辑与行动启示

2002 年南北研究所与非洲经济研究所召开独立会议，探讨非洲发展战略中的自主权与伙伴关系的议题。会上指出近年来对援助自主权的关注日增，其中有三个关键性的背景因素：（1）发达国家对援助政策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它们想改革援助政策、援助项目以及援助实践。（2）非洲领导人想在非洲发展中占据主导，这也是制定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首要目的。（3）国际非政府组织（NGO）与公民社会组织（CSO）逐渐兴起，它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自主权、参与性、伙伴关系方面也拥有一定的话语权（Rodney Schmidt, 2002）。

● 援助中的所有权与援助有效性

正如前面提到的，哥本哈根的改进巴黎宣言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认为，所有权是援助有效性体系中的最基础的环节，是保障援助实效的根本性的条件之一（哥本哈根会议，2008）。

受援国的自主权在援助有效性中已成为基本原则。但截至目前，在援助有效性议程中主动行动的都是援助国，还未看到受援国的身影。在今后几年里将目睹受援国成为援助有效性议程的同行行动者（Philippe Besson, 2009）。

但是其他学者表达了截然相反的观点，Andrew Rosser 与 Alexia Simpson 认为，所有权不太可能对援助有效性产生特别大的意义，因为它忽视了所有权的政治基础。提高援助的有效性，需要合理分配和使用援助，在形成援助的有效性方面还要考虑到联盟的力量以及利益的配置方式方法（Andrew Rosser and Alexia Simpson, 2009）。

● 援助中的自主权与援助依赖

什么是援助依赖？当一个国家无法发挥其政府的基本功能，比如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无法提供教育、医疗此类基础性的公共服务，这就是援助依赖。根据研究者对援助依赖潜在后果的研究，援助依赖之所以成为棘手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讨论。最极端的说法是援助依赖使受援国无法发展，或者说无法自我发展。当援助依赖达到高水平并长时间持续，这种极端情况才可能出现。当援助依赖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时，援助的积极作用往往被忽视。最客观的说法是援助在大多数国家的加速增长、发展、减贫都具有积极作用。但同时，降低援助依赖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带



来严重的后果。(1) 援助依赖导致政治自治权的缺失；(2) 不利于国家职责的发挥和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提供基础服务；(3) 在政府开支方面缺乏预测性 (Real Aid 报告, 2011)。

对援助的过度依赖易导致援助中受援国主权和自主权的丧失。一方面，非洲国家政府以来援助并把其作为一种政治支持。非洲政府习惯于依赖援助，因为援助能够增加他们的预算，还能带来大量物资及服务、技术，这都是当政者需要提供其人民的。这种对援助的依赖使得非洲政府均不愿意采取更强有力的或是超出援助国援助范围的政策立场和发展战略。他们担心会引起援助的减少，这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支持率及其下一届竞选。

对援助的依赖促进了不平等的屈从关系。脆弱不堪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对援助的高度依赖，使受援国自然而然地处于从属地位。与此同时，附加在援助上的永久条件、无孔不入的谈判、制度的纠缠及援助的碎片化令政界及公务员纷纷抵制，他们要求改变援助条款，用援助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斯坦福大学教授们的研究表明，巴黎宣言中所言的所有权，与依赖援助的非洲国家自主权并非截然不同，与其要求受援国政府首先行动，不如由援助国开始，认真面对援助所有权的问题，在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关系中尝试改变。

援助国应尽量避免去改变和操控受援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制度。在以往提供援助过程中，援助国同时都力图转变受援国的社会体制，直接参与调解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但这种做法对受援国有害，非洲的民间社会组织已经开始向援助国施压，让援助国应采取更加民主的方式，而不是直接与受援国政府建立政治问责制。相反，援助方应留给受援方政府时间、空间上的自由度，令其自主发展 (Paolo de Renzio, 2008)。

● 援助中的自主权与政府治理、善治

Michale Hubbard 通过对柬埔寨的实地调查归纳出低自主性恶性循环：低能政府--低自主性--政府对援助资金管理的低能--援助国对受援国政府的低信任度---对援助项目更多的干涉-更加定低能的政府 (Michale Hubbard, 2005)。

善治作为一个可预测的、公正的、持续性的治理制度，在贫穷国家里是提高人均收入的关键因素。外部援助能否带来本国的善治，或改善本国的治理情况？突然而来的外部收入能够使贸易形式发生变化，充足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不可多得的机会。然而众所周知的“荷兰病”现象警告各国，自然资源的大量出口正在一步步削弱手工业及农业部门的能力，从而抵消了经济的增长。Sachs and Warner 已经发现，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国家，其国民收入增长慢。(Sachs and Warner, 1995) 飞来之财可能还会以与“荷兰病”无关的政治形式来引起发展速度的减缓。自



然资源、国外援助、贸易地位改变等形式的“横财”也许会导致治理制度、投资水平及收入增长的停滞不前, (Knack and Keefer, 1995; Mauro, 1995)。这样可叫做“扎伊尔病”的效应引发了不正当竞争, 腐败与错误的政策(Dollar and Pritchett, 1998: 1)。

针对这一问题, 世界银行的 Stephen Knack 基于对跨国的实证研究(指标为官僚制水平、腐败程度、法治情况)得出, 援助依赖减弱了责任, 从而能潜移默化地降低制度的水平、引发腐败, 助长了援助资金管理中的矛盾, 阻碍了对低效政策及制度的改革(Stephen Knack, 2010)。

政策含义必须被小心翼翼地表述, 并且还需要更多研究的论证和支撑。更深入的研究可将研究视角聚焦到那些使得治理水准下降的无组织的援助上。(Brautigam and Botchwey, 1998; Moore, 1998)。

● 自主权与伙伴关系

早在 1995 年, OECD-DAC 的主席就曾对维护援助自主权与建立伙伴关系定下基调: 若援助国坚信受援国自主权和受援国参与等理念, 那么它们就要尝试使用一些合作的方法或渠道, 以避免这些理念遭到破坏, (OECD, 1995, p.7)。

非洲是全球受援国集中之地, NEPAD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是 2001 年在赞比亚卢萨卡的第 37 届非洲首脑会议中由非洲自主制定的第一个全面规划非洲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蓝图。在 NEPAD 框架下, 非洲呼吁与发达国家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而新伙伴关系与援助自主权是紧密结合的, 新伙伴关系的前提即为保障非洲发展的自主性。然而在发达国家的强势控制之下, 所谓的新型伙伴关系能否成真? 南北研究所的首席研究员 Rodney Schmidt 认为这取决于当受援国伙伴们改革了本国的民主制度、经济管理方式时, 援助国伙伴还是否支持这些超乎传统的, 但合理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还取决于援助国能否支持受援国对本国自身改革表现进行独立监测的机制(Rodney Schmidt, 2002)。

5. 干预还是自主? ----对援助自主权发展趋势的讨论

因此, 援助中完全的自主权是可能出现的吗? 援助是否能够真正实现无附加条件? 对待援助中条件问题, 中西有迥然不同的立场: 中国实质上将附加政治条件贬义化, 认为在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就是对受援国自主权和内政的侵犯; 而西方国家则将附加政治条件褒义化, 主张将附加政治条件作为更好实现对外援助目标的重要前提。中国学者姜磊、王海军在对中西不同立场进行分别研究, 提出应考虑将附加政治条件的理解中立化, 与自主权和干涉内政问题相脱钩, 使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具有一定弹性(姜磊、王海军, 2011)。正如非洲发展银行行长 Donald Kaberuka 所说, 事实上援助只是一种实现发展的手段, 真正有效的援助肯定不会引发依赖等问



题 (Real Aid 报告, 2011)。因此, 我们应该关注的不是援助的不良后果, 而是关注援助本身, 提高援助质量。在援助过程中是接受干预还是争取自主, 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选择题, 要根据实际的发展情况来判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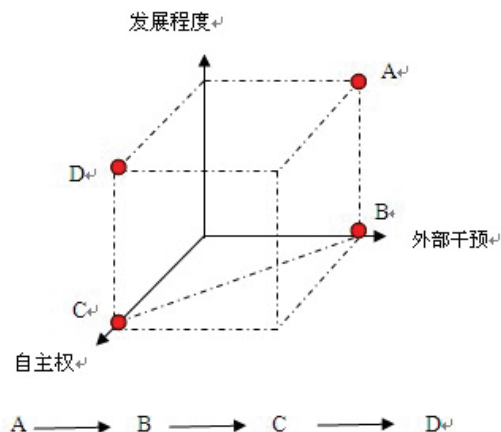
笔者设计一个发展图来表示受援国在援助中自主权的正常发展趋势, 将其命名为“矩形路线”。所谓“矩形路线”, 就是受援国将按照图中由 A 点至 D 点的轨迹进行运动, A、B、C、D 四点连结为一个矩形。X 轴为援助国的外部干预程度, Y 轴为受援国自主权, Z 轴表示援助带来的发展效果。

A 点: 干预下的高发展阶段---外部干预值很高, 自主权值很低, 发展程度高。在受援国接受援助的初期, 由于受援国国内经济、社会实力薄弱, 技术、管理水平远低于援助国, 因此在援助项目的实施和设计中主要由援助国主导。此阶段由于援助物资突然涌入, 形成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B 点: 干预下的低发展阶段---外部干预值很高, 自主权值很低, 发展程度低。随着援助的持续跟进, 在不改变受援国国内体制情况下, 援助所能带来的增长已达到极限, 发展速度减缓; 同时受援国意识到应占据援助过程中的主导权。

C 点: 自主权下的低发展阶段---外部干预值很低, 自主权值很高, 发展程度低。在初步主导援助的时期, 受援国国内配合进行制度改革与完善, 这些改革有较长的时间跨度, 因此援助效果不可能立即显示, 加之受援国缺乏经验和技术, 在摸索中自我前进。

D 点: 自主权下的高发展阶段---外部干预值很低, 自主权值很高, 发展程度高。D 点是援助中援受关系最理想的点。即使援助国完全放开对援助的控制, 受援国仍能自我管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矩形路线”只是基于学者们现有研究基础上, 笔者的臆想与设计, 还未通过实证验证, 并且将援助发展过程中几个环节完全简化了, 而实际



援助中的情况更加复杂和多变。因此需要进一步论证。

6. 结语

几十年的国际发展援助在前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而这些成功大多来自援助国主导的以强硬干预政策为主的援助形式。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援助无效论甚至援助有害论开始成为一种共识，对受援国自主性问题的反思由此而发。以《巴黎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文本要求受援国在国家发展过程及实现国家发展战略过程中发挥其主导权，以及协调好各种援助活动之间的关系。然而，对受援国自主性的主张主要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援助方来发出的，即使巴黎宣言与阿克拉议程是由包括援受双方的所有与会国家达成的，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是发达的援助国，鲜有作为受援方的发展中国家自己对援助自主性的话语表达。援助国在援助自主性问题上占据了主动，掌握了该领域的话语霸权，在对援助自主性进行主张与阐述时并未或者很少结合受援国的需求与态度。受援国自主性与降低援助依赖、提高援助有效性、改善政府治理水平以及与他国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本文的最后对援助国的干预与受援国的自主性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建立了一个理想化的发展趋势---“矩形路线”。

参考文献

- [1] Alan Fowler (2009). Introduction Beyond Partnership: Getting Real about NGO Relationships in the Aid System. IDS Bulletin: Volume 31, Issue 3.
- [2] Alan Fowler (2000). Beyond Partnership Getting Real about NGO Relationships in the Aid System. IDS Bulletin: Vol 31 No 32000.
- [3] Andrew Rosser, Alexia Simpson(2009). The Ownership Agenda: Will it Enhance Aid Effectiveness? Asia Research Centre Policy Brief: No.3, January 2009.
- [4] Birdsall, N. (2004). Seven Deadly Sins: Reflections on Donor Failings,. Working Paper of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Number 50.
- [5] Browne S. (2006). Aid and Influence: Do Donors Help or Hinder? London: Earthscan.
- [6] Brautigam, Deborah, Kwesi Botchwey (1998). The Institutional Impact of Aid Dependence on Recipients in Africa.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7] Deborah Bräutigam (2000). Aid Dependence and Governance: Expert Group on Development Issues, 2000:1.
- [8] Dollar, David, Lant Pritchett (1998). Assessing Aid: What Works, What Doesn't, and W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David Booth (2011). Aid Effectiveness: Bringing Country Ownership (and politics) Back in. Results of ODI research presented in preliminary form for discussion and critical comment.2011 (8): Working Paper 336.
- [10] Enriching the Paris Declaration: Promoting Democratic Ownership Workshop Copenhagen: May



- 13, 2008.
- [11] Knack, Stephen, Philip Keefer (1995).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ross-Country Tests Using Alternative Institutional Measures. *Economics and Politics*: 7(3), 207-27.
- [12] Masashi Nagasu (2004). Ownership in Cambodia---Review of Process of Preparing.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November, 2004.
- [13] Moore, Mick (1998). Death without Taxes: Democracy, State Capacity, and Aid Dependence in the Fourth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4] Michael Hubbard (2005). AID MANAGEMENT IN CAMBODIA: BREAKING OUT OF A LOW OWNERSHIP TRAP.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Dev.* 25, 409-414.
- [15] Maurizio Carbone (2008). BETTER AID, LESS OWNERSHIP: MULTI-ANNUAL PROGRAMMING AND THE EU'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J: Int. Dev.* 20, 218-229 (2008).
- [16] OECD(1995).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fforts and Policies of the Members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Paris.
- [17] OECD-DAC (2005). Paris Declaration on Aid Effectiveness: Ownership, Harmonization, Alignment, Result and Mutual Accountability, Paris: OECD High Level Forum.
- [18] Peter De Valk (2009). AID TAKEN FOR GRANTED? FROM LOCAL "OWNERSHIP" TOWARDS "AUTONOMY" IN AID PROJ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ood Governance* : Volume 1, ISSN No. 0976-1195.
- [19] Philippe Besson (2009). Country Ownership and Aid Effectiveness: Why We All Talk About It and Mean Different Things *Efficacies de l'aide: Bilan et Perspective*: No.46, 1/2009.
- [20] Peter de Valk (2010). Aid Taken for Grant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Good Governance*: Volume 1, No. 1.2 Quarter II 2010 ISSN No. 0976 -1195.
- [21] Rodney Schmidt (2002). Ownership and Partnership in Africa's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June 12th, 2002.
- [22] Sachs, Jeffrey, Andrew Warner (1995).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 NO.5398.
- [23] Stephen Knack (2000). Aid Dependence and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Analysis: 2000.
- [24] SusanB, Epstein, Matthew C. Weed (2011). Foreign Aid Reform: Studies and Recommend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28, 2009.
- [25] Tokyo Declaration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okyo: October, 1993.
- [26] Tokyo Agenda for Action 1998. Tokyo: 1998.
- [27] Van de Walle N. (2005). Overcoming Stagnation in Aid Dependent Countries. Centr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 [28] Volker Hauck, Tony Land (2011). Fostering Democratic Ownership—A capacity Development. ECDPM Discussion Paper: No.103, February 2011.
- [29] 李安山 (2008).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与日本援助非洲政策. *西亚非洲*: 2008(5).
- [30] 姜磊, 王海军 (2011). .现行对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条件差异分析. *太平洋学报*: 2011 (7) .



国际发展援助可持续性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王伊欢¹ 赵杰²

摘要：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巨额援助投入与受援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并不相称，援助没有达到期望效果。究其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援助缺乏可持续性造成的。国际发展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在西方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而国内对于援助可持续性问题的探讨尚未进入系统的研究阶段。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援助可持续性问题国内外研究现状，从多个维度分析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关键词： 国际发展援助 可持续性 援助有效性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Abstract: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huge amou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failed to reach expected effects due to the relatively low development speed of those recipient countries. This has been largely caused by the un-sustainability of the aid. The issues of sustainability thus have got certain attention from the western societies, while the domestic scholars have not started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issues yet. The essay reviewed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research on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It analyzed the existing insufficiencies to the research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identified the further research issues in the fiel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id, Aid effectiveness

¹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教授.

²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硕士研究生.



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支持。自1960 年开始,通过各种双边和国际多边机构,已有大约3.2万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从富国流入了穷国(Fengler et al, 2010)。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捐赠者——提供资金占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一半以上的欧盟,其在2011年承诺的发展援助金额达113.24亿欧元。³然而,到目前为止,巨大的援助投入与受援国的总体发展水平并不相称,援助显然没有达到期望的效果。究其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援助缺乏可持续性造成的。美国国际开发署通过对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212个教育项目进行内部评估,发现其中90%的项目都是不可持续的(Kean, 1988)。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550个教育项目中,只有一半是可持续的(World Bank, 1990)。

中国的对外援助以1950年向朝鲜和越南两国提供物资援助为序幕,一直持续至今。近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2004年以来,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保持快速增长,2004年至2009年平均年增长率为29.4%。中国的对外援助形式主要有:成套项目、一般物资、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援外医疗队、紧急人道主义援助、援外志愿者和债务减免,涉及农业、工业、经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重点帮助受援国提高工农业生产能力,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改善基础教育和医疗状况。⁴然而,中国的对外援助也没有逃离不可持续的怪圈:在以双边援助和项目援助为主的援助形式中,许多援助项目都出现了中国专家在时运转良好、效益较高,但一旦中国人撤走,项目就逐渐荒废的现象,且项目运转对政府援助资金的依赖度较高,政府背的包袱日渐增加(鄢文聚,2000;唐正平,2002;徐继峰,2011)。

援助的不可持续性是对援助效果的极大损害,既浪费了捐赠国的物质及人力资本,又不利于受援国走向自力更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对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对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变得尤为重要。国内外学者就该领域的研究达成了共识,Reinhard Stockmann 认为,既然持久的、长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的改善是合作活动的潜在目标,那么发展项目的可持续性即无可争议地代表了评估这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的主要标准(Stockmann, 1997)。国内也有学者指出,在现有援助工作的基础上,关注援助效果的可持续性和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深化中国援助的作用和影响,而且可以通过对援助项目的长期投入来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周弘,2008)。本文拟对国内外现有的关于可持续研究的主要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和分析,探讨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方向,为更好地指导中国对外援助实

³ Annual Report 2012 on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assistance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2011, http://ec.europa.eu/europeaid/multimedia/publications/documents/annual-reports/europeaid_annual_report_2012_highlights_en.pdf.

⁴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http://www.gov.cn/gzdt/2011-04/21/content_1849712.htm.



践提供参考。

1. 援助可持续性的研究概况

国际援助最早起源于西方，以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实施为开始标志。因此，国外对于援助可持续性的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系统。国际上对援助可持续性问题关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主要侧重于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其中，国际援助机构如美国、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的国际开发署，国际计划、世界银行等组织相继针对这一问题撰写了援助项目的评估指南、评价手册和评估报告等，提出了项目可持续性的概念并探讨了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评估团队通常由多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社会科学分析员、公共卫生专家、人口统计学家、人力资源开发专家以及项目经理等等。另外，BOSSERT、STOCKMANN、POWELL 等学者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⁵

相比之下，国内在对外援助方面的研究总体来说尚未形成体系。2000 年以后，农业部、商务部、非洲农业开发中心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就中国对外援助情况有一些介绍基本情况的文章，然而直接关注援助可持续性的文章比较有限。大学在对外援助方面的产出偏向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方向⁶，对于援助可持续性的研究则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特别是与教育和培训有关的研究，都是由国际援助机构自己进行的（Powell，2001）。尽管近年来一部分捐赠者在试图解决可持续性的问题上付出了大量努力，并积极判断影响可持续性的因素，但是，仍然有许多国家几乎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探讨，或在其努力中利用的手段不足。如在德国，奥地利，瑞士的政府和非政府的捐赠机构里，评估工具中就缺乏事后评估的内容（德国的复兴信贷银行除外）。世界银行是第一个开始做具体可持续性研究的捐赠机构之一，其研究始于 90 年代中期。美国国际开发署也在 80 年中期开始进行此类研究。

⁵ Thomas J. Bossert . Can they get along without us? Sustainability of donor-supported health projects in Central America and Africa [J]. *Sot. Sci. Med*, 1990,30(9); Thomas J. Bossert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Guatemala: 1942-1987[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0; Thomas J. Bossert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Honduras:1942-1986[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8;Reinhard Stockmann.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An Impact Assessment of German Vocational-Training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J]. *World Development*, 1997,25(11); M.Powell.A comparative study of TVET projects —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from Jamaica and The Gamb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1,21.

⁶ 张郁慧.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6;李巧玲.中日对外援助的比较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王红明.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目标分析[D].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至今,在发展合作的可持续性方面做过最为综合调查的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援助评价专家组。它呼吁其成员在1986年之后所做的评估中加入可持续性的部分,并为此目标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问题目录。然而,这样的研究仅在总结项目经验时使用(Stockmann, 1997)。美国国际发展署在1990-1998年相继做了一系列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分别围绕美国在洪都拉斯、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危地马拉以及扎伊尔的健康计划、卫生项目或卫生部门的活动展开。它回顾了美国政府对这些国家卫生部门的援助历史,以此来评估项目在项目期内进行的活动或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否在项目资金结束后能够继续下去。⁷

Thomas J. Bossert 认为,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国际援助界的一个新兴趣点。即便如此,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援助资金停止后发生了什么。大多数项目的评估是在项目期内进行的,主要评估那些能够被解决的问题,以此来改善项目。有些研究评估项目的影响,即项目是否能够提供项目预期目标的利益。但是,至今较少有人在资金结束后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评估一个项目(Bossert, 1990a)。与此同时,应该注意到在众多学者就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的有效性进行的讨论中,虽没有明确指出其与援助可持续性的关系,但也或多或少地涉及了影响援助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如对援助国的严重依赖,援助未与受援国国民的发展需要和目标相结合,受援国薄弱的经济政策环境等。⁸

2. 援助可持续性的定义

在本文中,援助的可持续性主要是指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项目的可持续性(Project Sustainability)在国际援助领域日益成为一个中心议题(Nhi Quyen Le, 2006);在发展援助专家编制的各种手册中出现,例如丹麦的国际开发署(Danida),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Sida),国际计划(PI),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银行的独立评估小组等。但实际上,发展援助学者并没有在项目的可持续性这个概念上存在统一的定义,在他们的发展论坛上也并没有专门提出项目的可持续性指的是什么,当时提出的一个关于“操作和维持(或制度和管理)的可持续性”的概念要

⁷ Adamchak Susan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Senegal[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0; Thomas J. Bossert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Guatemala: 1942-1987[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0; David w. Dunlop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Tanzania; 1971-1988[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0; Nancy Mock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Zaire: 1972-1988[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0; Thomas J. Bossert et al.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Honduras: 1942-1986[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

⁸ 见汪淳玉,王伊欢.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3).



远多于任何生态可持续性的概念 (Nhi Quyen Le, 2006)。一般在提到项目持续的现象时, 常常使用以下几个词, 如项目“维持”“可持续性”“制度化”“合并”“整合”“常规化”, 本地或社区“所有权”及“能力建设”。

项目可持续性的概念众说纷纭, 总体来说, 主要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指项目目标或活动的持续, 项目通过制度化的过程融入当地已有的机构中。Thomas J. Bossert 在对美国援助中美洲和非洲的健康项目进行研究时认为, 如果项目的活动和利益在项目周期结束至少 3 年后还能够继续, 则可以认为该项目是可持续的。但由于在大多数案例中并不容易判断实际的项目利益, 因此作者假设继续项目的活动就会产生持续的利益。检验项目可持续性的具体方法是: 判断每个项目在其周期结束后产出是否会继续, 然后进一步确定这些产出的资金来源。在美国的资金中止后, 如果项目能够得到来自受援国的资金支持, 则显然是可持续的; 也有一些项目结束后的支持是由其他外国捐赠者支持的, 且这种支持是可被撤回的。如果受援国在未来有可能继续得到这种支持, 那么项目仍被认为是可持续的 (Bossert, 1990a)。再如, Mona C. Shediak-Rizkallah 等在其《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项目的可持续性规划: 概念框架和未来研究, 实践和政策方向》中, 引用了一系列可持续性的定义, 并且把“在一个组织的结构内继续项目的活动”归纳为项目可持续性的三种不同视角之一 (Shediak-Rizkallah et al, 1998)。

第二类定义强调项目的利益或正面结果在外部援助结束后仍能够持续。绝大多数研究者同意这种观点, 只是在利益的持续是否需要依靠项目活动的持续这一点上有所争议。Nhi Queen Le (Le, 2006) 是致力于探讨项目可持续性的研究者之一, 他就各种国际援助机构和发展专家编制的项目手册、操作策略、计划和工作方式中所提到的项目可持续性的定义进行了总结, 可以看到这些定义虽然说法不同, 但都侧重于项目利益的可持续性:

“正面影响有可能在外部援助结束后继续的迹象” (Danida, 1999:61);

“在项目结束后, 项目的目标被继续实现的程度” (Plan International, 2002b:24);

“在援助支持撤回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 干预的利益在一个恰当的水平被保持的可能性” (Sida, 2004:35);

“通过项目得到的技术合作结束后, 项目正面结果的耐久性” (UNDP); “通过测量项目预计的净收益保持或超过项目预期寿命的可能性来反应项目对风险的弹性” (The World Bank's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捐赠者的主要援助结束后利益的持续” (Young and Hamshire, 2000:7)。

Reinhard Stockmann 也总结到, 德国复兴银行, 美国国际开发署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所使用的定义是以产量或生产为导向的。可持续性被定



义为“在捐赠者的技术、管理和财政支持结束后，项目能够继续提供服务或持续的利益”。这一方法把可持续性操作化为“永久向受益者流动的利息”，使持续性简化为一个项目能够作为“结果”被测量的物质利益，如收入或学校毕业率，入学率，出生率或产出（Stockmann, 1997）。持同样观点的还有 Mona C. Shediak-Rizkallah，他认为对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项目而言，“保持在最初的项目中获得的健康收益”是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视角之一（Shediak-Rizkallah et al, 1998）。

Young, Lincoln 等人 在其《Promoting Practical Sustainability》手册中定义项目的可持续性：援助方的援助基本结束后利益仍能够持续。这个定义还包含 5 个关键要素：（1）它关注的是未来的利益可持续而不是项目本身是否可持续，而利益可持续性并不一定意味着 AusAID 活动的持续；（2）可持续性管理是一个过程，旨在可持续的利益最大化；（3）无论双边还是多边援助，其设计和管理的目的都是完成利益的可持续；（4）如果个人的计划或项目在中期规划中被认为不能提供可持续的利益，那就应该在项目设计书上明确的指出来；（5）假设主要的外部资金支持结束后，维护利益流动的的利益相关者将提供资金，技术和管理（Young, Lincoln & Jonathan Hamshire, 2000）。

Elinor Ostrom 等在其对瑞典国际开发署（Sida）对外援助活动的动机、可持续性做的经验研究报告中，定义其可持续性是指合作效果的长期性，而不是特殊的项目活动。在印度的一个案例中，作者指出该项目的可持续性应该是指合作投资能够持续下去，而不是援助方的财务支持（Ostrom et al, 2002）。

第三类定义更偏重项目的深远影响，重点在于项目为当地人群带来的能力建设、创新意识等，人们由此能够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等方面。Mona C. Shediak-Rizkallah 认为，“在接受健康干预的社区进行能力建设”是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定义之一（Shediak-Rizkallah et al, 1998）。另外，Reinhard Stockmann 在对以往各种定义进行总结时强调创新意识的重要性，其下又分为三个子定义（Stockmann, 1997）：

第一个定义是由瑞士发展合作社，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联邦部，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使用的，以项目为导向：“如果项目实施机构和/或目标群体在长期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能继续从项目中获得创新”，那么这个项目就是可持续的。

第二个定义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以系统为导向：“技术合作的目的应该是改变一个系统中一个或更多或所有组成部分的性质和表现。这样它就是系统的进化，在这个系统里引进了技术合作，这应该是可持续性的关注焦点。”

第三个定义被提到的较少，其直接以创新为导向，包括实施机构或目标群体对变化的环境条件做出灵活反应的能力。这意味着不是以同样的方式简单复制服务，而是给定的目标群体，实施机构，甚至是一个系统能够适应变化的环境条件。这一



观点的关键是，捐赠者是否能够使目标群体和实施机构自己把全社会创新和传播的过程以一个持续和持久的方式转换成行动。

Reinhard Stockmann 认为，项目干预与执行机构本身有联系，或超出这个机构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因而区分了可持续性的两个维度（Stockmann，1997）：

内部可持续性，指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在项目执行机构里创立能够充分解决问题的结构，以使项目产生的影响与目标相合，而不是被意外的负面效果所抵消；执行机构能够对改变的环境条件具有永久的适应性。

外部可持续性：因为项目产生的影响超出了执行机构的范围，在执行机构外部环境中获得的传播效果代表了评价项目可持续性的第二个关键标准。

上述定义内涵在逐步深化，而事实是无论哪一种定义都不能完全覆盖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的含义。因此，我们或许对于可持续性状况进行分级来说明项目的可持续水平。如达到项目活动延展效果的称为援助项目“一级可持续”，项目效益继续的相关情形称为“二级可持续”，而发生了创新等结构性、内生性变化的则可称为“三级可持续”。这样的分级方式即可对于援助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设计、实施和评估有所帮助。

3. 援助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以实地研究为基础探讨了影响援助项目可持续的因素，如 Thomas J.Bossert, M.Powel, Young, Mona C.Shediac-Rizkallah 和 Lee R.Bone 等等。对项目可持续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完整总结的应该是 Mona C.Shediac-Rizkallah 和 Lee R.Bone(1998)。他们以健康干预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三种方法收集信息：用 Medline 搜集过去 15 年的出版物；手工搜索主要的健康教育和健康宣传的期刊；在已发表的论文中的参考文献中寻找。最终，他们把所有因素归类成三个大组：（1）项目设计和实施因素；（2）组织环境中的因素；（3）更广泛的社区环境的因素。结合其他学者对于相关内容的研究，本文将主要影响因素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与项目计划有关的因素。

与项目计划有关的因素是指项目的协商过程。包括：项目的方法和目标是否与项目社区的成员商量，并把他们当成平等的合作伙伴；项目主导者是谁，是社区的需求，还是外部捐赠机构或是技术专家的需求主导着项目；协商或者建立共识的过程是否对达成主要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妥协等。（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项目的性质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也会产生影响。例如是预防性的健康项目还是治愈性的等等（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第二，与项目实施有关的因素。



项目的参与程度：一个成功实施的项目更可能在启动和管理的过程中把当地人员包括进来，而且尽量使用当地资源。而不成功项目的特征是在实施过程中缺乏当地人的参与，同时依赖于从发达国家得到的人员和物资。(Powel, 2001)。

项目的培训情况：项目是否有培训内容。(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项目的持续时间：是一个新项目还是一个获得额外资金的已有项目 (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项目的技术因素：要传递的技术必须在技术、财政以及社会、文化及性别等标准上是适当的，并且需要有一个相关的、恰到好处的和持续的培训 (Young, Lincoln & Jonathan Hamshire, 2000)。

第三，与项目影响有关的因素。

项目的有效性：项目（令人满意和不满意的）的间接影响是什么？ (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第四，项目的财务因素。

“项目的资金来源是什么（内部，外部，混合）？社区本地的资源是什么？社区能够负担得起项目吗（例如，能否支付维持费和经常性费用）？社区成员愿意/能够为服务支付多少费用？合适的帮助财政自给自足的策略是什么？” (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99)

另外，Young 指出，进行财政和经济分析，奖励对方实物或现金，考虑后续运营成本问题，使用者支付成本，以及鼓励私人部门的参与等都是在财政方面影响可持续性的因素 (Young, Lincoln & Jonathan Hamshire, 2000)。

第五，项目的组织管理因素。

其一，项目机构的能力。一个薄弱、目标矛盾、分散、领导力不足、低技能且反应迟钝的官僚集权机构是不太可能管理持续的项目的 (Bossert, 1990a)。

其二，与现有项目/服务的整合程度。“项目是垂直的还是水平的（综合的或集成的）？”“目标、目的和方法是预先指定的还是适应当地人口和环境并且随时间变化的？项目是否整合进了其东道主组织的日常运行实践中？项目的任务是否与东道主组织的任务和活动相融？实施项目的组织是项目资金的接收者还是中介组织？” (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99) 以及对当地机构管理（或吸收）新的结构、系统、观念和资金的能力进行充分评估 (Young, Lincoln & Jonathan Hamshire, 2000)。

其三，个人因素。“项目有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吗？他/她的特性是什么？如果没有，可否确定/培养一个人，以便于他/她能为项目的继续服务？项目从上级得到支持了吗？它被支持的情况如何？” (Shediac-Rizkallah et al, 1998: 99)

第六，宏观因素。



其一，受援方与援助方的政策。其中受援方的政策包括政策环境和政策适应性；援助方的政策包括援助的规划、交付和承包机制、运营和维护费用（Young, Lincoln& Jonathan Hamshire, 2000）。

其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考虑。在案例研究中，Bossert 发现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状况阻碍了非洲国家的可持续性（Bossert, 1990a）；M.Powel 认为，当地物质和政治基础设施的影响是造成项目长期不可持续的原因（Powel, 2001）。政局稳定、发展水平、外部经济冲击和自然灾害也是可以参照的衡量指标（Young, Lincoln& Jonathan Hamshire, 2000）。

其三，社会、文化和性别。改变当地人行为的项目需要更长远的眼光，且必须使利益真实可见；妇女在项目的确认、设计及决策阶段的参与是保证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跨文化的意识及培训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Young, Lincoln& Jonathan Hamshire, 2000）。

上述因素涉及了援助项目周期的各个环节和要素，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影响援助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然而，以往研究没有提及的项目区的当地资源动员情况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需求的谈判和妥协对于项目的可持续性来说尤为重要。

4. 可持续性与援助依赖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还有学者认为，对援助的依赖也是导致援助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M.Powell 针对牙买加和冈比亚的技术和职业教育与培训（TVET）项目的实施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确定了海外援助机构扮演的角色，以及对外国顾问和项目活动（从发达国家获得）的依赖所产生的影响（Powell, 2001）。

一方面，援助的项目对 TVET 的机构有重要的影响。尽管捐助机构是善意的，但很多项目都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不可持续，并且项目对执行机构的影响甚至可以被视为是扭曲的。

另一方面，这种对海外援助及技术援助的依赖对项目的实施和长期的可持续性方面都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作者总结了依赖的不同类型，包括强制依赖——捐助机构使用援助资助的项目来提高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在促进本国的出口方面，还是游说某个国家的某机构采取某种政策；互惠依赖——发展中国家的 TVET 机构从项目提供的资源和活动中获益；意识形态依赖——在实施过程中或之后产生，对 TVET 机构有不利的影响（Sklair,1992）；依赖反转——援助机构帮助减少 TVET 机构对城市和协会的依赖；永久依赖——TVET 机构需要长期不断的资金；自我强加的依赖——当机构管理人员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吸引海外援助的政策时。Powel 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措施减少对援助的依赖，从而实现既定的项目目标，同时使项目长



期可持续 (Powell, 2001)。

目前, 援助依赖的理论概念尚未形成, 有关研究也缺少对于降低援助依赖的有效分析和建议。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对于项目依赖程度的评估和分析是减少将来项目实施中的依赖性的重要手段; 同时分析无法避免的依赖可能产生的原因, 并制定相关措施降低依赖。

5. 提高援助可持续性的建议

在援助不可持续的问题提出之后, 众多的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改善不可持续状况的建议。有人以在实地调研发现的问题为源头, 寻找具体解决的方法; 有人从不同群体的视角提出了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 应该按照项目的周期开发促进可持续性的工具; 也有建议将政府的援助项目与企业的市场经营相结合,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等。

Thomas J.Bossert 发现, 项目的可持续性与环境因素, 项目执行机构的能力及项目本身的特征有关, 并针对这三点分别提出了建议: 一是捐赠国在期待非洲的健康项目能够持续之前应该解决更广泛的发展问题; 二是捐赠国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加强机构的发展上去; 三是项目的设计和管理应该遵照以下几点进行: (1) 展示项目在明确界定的目标和目的上的有效性; (2) 使项目活动充分融入既定的行政结构; (3) 在项目周期内从国家获得高水平的资金; (4) 在给予和接受的相互尊重中协商项目的设计; (5) 把有力的培训部分包含在内(Bossert, 1990)。

Mona C.Shediac-Rizkallah 和 Lee R.Bone(1998) 在对美国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干预项目的可持续性进行分析后, 从研究者、实践者及政策制定者这三个角度分别总结了学者们所提出的关于提高可持续性的未来发展方向 (Shediac-Rizkallah, Bone, 1998)。

对于研究者而言, Lee R.Bone 等认为未来的研究一定要清晰地确定在特殊的环境下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方法, 并明确说明适当的可操作的测量方法。其次, 作者还发现, 尽管多数学者都同意将可持续性作为一个总体目标, 但对于应该使什么可持续仍然有争议。另外, 作者认为, 今后应该对不同环境下可持续项目的过程进行比较研究, 因为尽管不同环境下可持续性的规划是相似的, 但多样的环境下可能会给予不同的因素不同的权重。最后, 对于测量制度化和能力建设的工具, 作者认为应该对它们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和验证, 以便在不同的环境中能够被广泛地使用 (Shediac-Rizkallah, Bone, 1998)。

对于实践者而言, 作者认为在他所提到的影响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中, 有一些是应该被项目的成员所控制的。如, 提高社区的参与程度; 培训社区成员以促进项



目的持续；为项目或项目各组成选择的组织基础；培养项目中出类拔萃的人，他们可以支持项目的持续。另外，新项目需要充分的启动时间，以便与社区中现存的项目和组织产生联系；政策制定者和资助者必须就项目影响的延迟做出调整。项目有效性的过程和中间的措施可以被用来传播项目活动，提高项目的可见度以及项目成员和领导对工作的承诺。这些早期的结果可能对较早的可持续性规划的产生有刺激作用（Shediac-Rizkallah，Bone，1998）。

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作者认为，除非资助者和政策制定者调整其财政活动，否则可持续的过程是不太可能实现的（Shediac-Rizkallah，Bone，1998）。

以上的建议固然客观，但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的界定未免在一定程度上过于简化。政策制定者也好，实践者也好，也可根据项目规模和性质分为不同层次。对于不同层次的人员具体措施显然有所不同。此外，援助机构本身在项目的可持续性方面责任重大，他们掌握着援助资金的“生杀大权”，认真审核批准一个可持续的项目，阻止一个显而易见的不可持续项目的发生是援助可持续的最根本的前提。其次，项目受援方政府及相应机构对于不可持续项目的判断和谈判也成为援助可持续的重要环节。

Griffiths 等人则按照项目的周期，即确认、准备、评估、实施和监测、项目完成报告这样一个顺序开发了促进可持续性的工具。其中在确认阶段，作者指出必须充分地分析可持续性的前景；准备阶段需要项目设计文件、合同的准备和管理、谅解备忘录；评估阶段需要评估说明、对评估的反应、批准继续实施的呈递书；实施和监测阶段需要年度计划、逐步撤出策略、国家的投资组合风险评估和监测计划、可持续性的监测指标、活动监测概要、技术咨询小组报告、中期审查报告；项目完成报告需要在人员撤出后的两个月之内完成等等（Griffiths & Young Design, Canberra, 2000）。这些工具较为有效地成为保证项目可持续性的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我们不必预期该工具形式的普世化问题。项目的背景、涉及人员、当地文化、具体情况等等会因为项目的不同而不同。有一个基本的工具框架，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工具改写和开发，才能够真正符合具体援助项目的需要。

此外，国内的学者针对中国对外援助的不可持续问题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主要观点认为应该遵循市场规律的作用，使援助的主体由政府逐渐转向企业，在这个转制的过程中增强援助的可持续性，最终有利于受援国的可持续发展。如刘曰峰等人（2010）指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纯的农业援助已经渐渐失去生命力。中非农业合作只有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达到企业目标与国家目标的融合，才能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陈燕娟等（2008）提出，在新时期新条件下，中非农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从政府援助模式向以企业为主体模



式的转型,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在援助方式和内容上都要有所转变。王晨燕(2008)认为,可以尝试推动政府援助与中资私营农场合作的新思路,增强农业援助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我国援外项目如果能与企业自营项目结合,利用好这些条件,对于援外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将十分有益,对于促进受援国农业发展应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转制固然对于可持续性有效,但对外援助的定义将需要另行探讨。转制后的企业,还属于不属于援助的范畴,长期转制了的企业是否能够持久地完成援助的责任,雇佣关系的转变对于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深远影响又是什么,这些都成为研究者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6. 问题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发展援助的可持续性问题在西方已经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学者主要集中探讨了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定义、影响其可持续性的因素、与援助依赖的关系等;相对地,国内对援助可持续性的关注还比较有限,尚未进入系统的研究阶段。在援助项目缺乏可持续性 & 提高援助可持续性的建议方面,国内外的学者则都有所涉及。

从时间上来看,大规模的国际发展援助始于西方,援助体系更为系统、实践也更为成熟,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普遍早于国内学者。

从内容上来看,由于国内外实践的不同,学者们关注的可持续性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当援助的持续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国外学者主要从影响援助项目可持续性的因素分析出发,力图通过不同视角、各种群体自身的改善对这一状况进行改变;国内的学者则根据中国援助方式改革的现实状况,寄希望于将政府与市场的力量相结合的转制方式。然而,学者在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的许多问题上也未能形成一致的结论,如对于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尚未形成统一界定,对于究竟使什么可持续仍然存在争论;缺乏对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进行测量或评估的成熟的、制度化的标准。

从研究对象上看,国际援助有不同的分类方式。根据援助的动机,可以分为战略性援助、发展性援助、人道主义援助;根据援助的提供主体,可以分为官方发展援助和非官方发展援助;根据援助的形式,可以分为双边发展援助和多边发展援助;根据援助的内容,可以分为财政援助、技术援助、粮食援助、减免债务;根据援助款的使用方向或者方式,可以分为项目援助、方案援助和预算援助。当前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某几个援助类型的具体项目层面。按照不同的项目类型,分别考虑项目的可持续关键因素,对于提高各种援助的可持续性将更加有所裨益。

从研究主体上来说,国际上对该领域进行关注的主体以多边或双边援助机构为



主，研究成果多以项目报告或评估的形式出现，大学或者其他第三方研究机构尚未就此进行更为深入系统的探讨。

此外，从研究方法和深度上来看，伴随国外多年对外援助历史成长起来的是日益壮大的相关学科体系和专家学者，他们提出的建议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践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中国的对外援助实践避免走传统援助国曾经走过的弯路；国内学者的观点同样有益，只是尚缺乏相关实证研究。

从广度上来看，国外学者的建议既涉及项目周期，又涉及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研究者、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等不同群体的角度；相比之下，目前国内学者仅仅停留在援助项目改制的层面上，其视野、研究范围等等还有待拓宽与提升。

由此，未来该领域的研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按照国际援助不同的分类方式，对其援助的可持续性做全面探讨，且根据不同类型特点建立可持续性测量指标体系；这个体系可以根据援助主体和受援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状况进行适当调适。

第二，援助的社会、文化、生态方面的可持续性问题，包括几个方面目前的可持续性水平、影响可持续性的因素及改善建议都应该作为与经济同等重要的重点研究领域。

第三，国内研究要注意采用实证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对现有的援助项目按照一定的分类方式，如行业领域或援助额等进行援助后评估和分析，探讨其可持续性，影响因素及改进措施。

第四，除援助机构之外的第三方应该充分加入国际援助可持续性的研究中来，以使研究的主体更加多元，研究实力更加雄厚，结论更为客观、有效。

参考文献

- [1] Adamchak,Susan& Aguiillaume,Claude & Bloom,Abby &Bossert,Thomas J& Godiksen,Lois H.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Senegal[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0.
- [2] Annual Report 2012 on the European Union's Development and external assistance policie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in 2011,
http://ec.europa.eu/europeaid/multimedia/publications/documents/annual-reports/europeaid_annual_report_2012_highlights_en.pdf
- [3] 3a. Bossert,Thomas J. Can they get along without us? Sustainability of donor-supported health projects in Central America and Africa [J]. Sot. Sci. Med, 1990,30(9).
- [4] 3b. Bossert,Thomas J & Godiksen,Lois H& Boostrom,Eugene & Greene,R.B.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Guatemala: 1942-1987[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0.



- [5] Bossert ,Thomas J.& Godiksen,Lois H& Bunce, T. Dwight & Favin,Michael & Dabbs,Carol &Massey,John.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Honduras:1942-1986[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8.
- [6] Dunlop,David w. & Godiksen,Lois H & Micka,Mary Ann & Muhondwa,Eustace & Mujinja,Phare & Stinson,Wayne.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Tanzania;1971-1988[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0.
- [7] Danida..EvaluationGuidelines[Z]. Copenhage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Denmark, 1999.
- [8] Fengler,Wolfgang. &Kharas,Homi. Delivering Aid Differently: Lessons from the Field[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0.
- [9] Kean, J.& Turner, D. &Wood, J. Synthesis of AID Evaluation Reports 1985 to 1986 — Evaluation Occasional Paper No. 16[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88.
- [10] Mock,Nancy B. & Bossert,Thomas J & Milanga,Miatudila. The sustainability of U.S.-supported health, population, and nutrition programs in Zaire:1972-1988[R]. Washington, DC: 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0.
- [11] Nhi Quyen Le. An Analysis of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Project "Industrial and Urban Development in Viet Tri City"(2002-2005).Denmark:Roskilde University Center,2006.
- [12] Ostrom,Elinor&Gibson,Clark&Shivakumar,Sujai&Andersson,Krister.Aid,incentives,and sustainability [R].Sweden: Sida Studies in Evaluation, 2002.
- [13] Plan International,2002b. Guidance on Plan Program Evaluation in CPME Evaluation Technical Guides. Plan International.
- [14] Powell,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VET projects —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s from Jamaica and The Gamb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2001,21.
- [15] Shediak-Rizkallah, Mona C. & Bone, Lee R.Planning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based health programs: conceptual framework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J]. Health Education Research, 1998.13(1).
- [16] Sida, 2004. Looking Back, Moving Forward. Sida Evaluation Manual. Stockholm: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Sida), Sweden.
(http://www.sida.se/shared/jsp/download.jsp?f=SIDA3753en_mini.pdf&a=3148)
- [17] Sklair, L.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M]. New York:1992.
- [18] Stockmann,Reinhard. The Sustainability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An Impact Assessment of German Vocational-Training Projects in Latin America [J]. World Development, 1997,25(11).
- [19] 18. The World Bank's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http://ieg.worldbankgroup.org/content/ieg/en/home.html>
- [20] 19. 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ttp://www.un.org/esa/sustdev/natlinfo/indicators/isdms2001/table_4.htm
- [21] 20. World Bank. Evaluating Results for 1988: Issues in World Bank Lending Over Two Decades, Operations Evaluation Department[R].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90.
- [22] 21. Young, Lincoln,Jonathan Hamshire ,2000. Promoting Practical Sustainability.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sAID), Australia.
(<http://www.ausaid.gov.au/publications/pdf/sustainability.pdf>)
- [23] 陈燕娟, 邓岩.中非农业合作可持续性研究[J].世界农业,2008(1).
- [24] 李嘉莉.对加强中非农业合作的若干思考[J].世界农业,2005(5).
- [25] 李巧玲.中日对外援助的比较研究[D].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26] 刘曰峰, 刘曙光. 中非农业合作研究综述[J]. 西亚非洲, 2010(12).
- [27] 毛小菁. 国际援助格局演变趋势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定位[J]. 发展与援助, 2010(9).
- [28] 唐正平. 前景广阔的中非农业合作[J]. 西亚非洲, 2002(6).
- [29] 王晨燕. 对非洲农业援助新形式的探索[J]. 国际经济合作, 2008(4).
- [30] 汪淳玉, 王伊欢. 国际发展援助效果研究综述[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7(3).
- [31] 王红明. 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目标分析[D]. 外交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32] 徐继峰, 秦路. 中国援助非洲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可持续发展建议[J]. 世界农业, 2011(12).
- [33] 郇文聚. 21世纪的中非农业合作[J]. 西亚非洲, 2000(5).
- [34] 张郁慧. 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35] 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 http://www.gov.cn/gzdt/2011-04/21/content_1849712.htm.
- [36] 周弘. 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11).



全球国际发展研究机构介绍



加拿大南北研究所 (The North-South Institute, 简称“NSI”) 作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无党派研究机构成立于 1976 年, 是加拿大历史最悠久的专注于有效的国际发展的独立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主要是识别致力于减少贫困和全球不平等的政策和实践, 从而为创造一个更加繁荣和稳定的全球社会做出贡献。

NSI 在理事会指导下进行, 理事会由来自于世界各地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理事成员构成。下设杰出研究协会, 研究员们以及世界知名的专家们运用他们大量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 NSI 应对国际发展研究中的广泛挑战, 其作用是指导和支持 NSI 的研究人员开展前沿的、与政策相关的研究。NSI 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加拿大国际发展署 (CIDA) 和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IDRC), 资金主要用于进行组织最前沿的政策研究。同时, NSI 也从经合组织(OECD), 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 加拿大海外发展研究所等机构和基金会获得资助。

NSI 追求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的目标, 重点集中在四个领域: 平等增长的治理; 全球流动与合适的工作; 脆弱的、受冲突影响的国家; 自然资源的管理。性别平等、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以来也是研究所的两个重要的工作主题, 力图确保在制定政策时把环境的可持续性和女性的经济、社会权利纳入其中。NSI 的研究虽然不排除中等收入国家, 但是更加关注于低收入国家特别是亚撒哈拉非洲国家。其主要任务就是通过研究指导决策者寻求更有效的发展援助政策, 减少贫困和全球不平等。

NSI 出版的材料范围广泛, 包括书籍、电子书、工作文件、政策简报、报告、演讲以及加拿大发展报告(CDR)。出版的书籍包括有《在危险地区的选举》, 《非洲妇女在细蓝线上》。NSI 也举行研讨会、圆桌会议以及午餐聚会探讨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的相关问题, 分享它的研究成果, 邀请前沿专家就影响发展和改变全球秩序等主题进行演讲, 如在渥太华举办的南北研究所—加拿大发展署讲座系列就邀请了国际劳工组织、非洲医疗研究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前沿专家们。

根据 2011 年 1 月 18 日, 加拿大全国新闻俱乐部在华盛顿发布的全球走向的智库索引, 在年预算额为五百万美元类别中, NSI 已跻身于世界顶级小型智库行列。稍后, 联合国大学就该索引和智库排名在纽约召开会议, 在超过 6000 个智库中, NSI 在墨西哥、加拿大、加勒比海地区类别中位居第六, 在三十个世界顶级发展智库中位列十八, 在对公共政策最具影响力类别中位列三十七。

更多详细信息, 请参加网站: <http://www.nsi-ins.ca>

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市与中央在京高校共建项目”
(北京市重点学科建设: 农村发展与管理) 资助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CID)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RCID)来源于1988年建立的中国联邦德国综合农业发展中心(CIAD), 该中心属于联邦德国和中国的双边发展合作项目之一, 其后又成为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在上世纪90年代期间, 大批中心的工作人员赴德国、荷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研究, 陆续回国后, 使得中心成为了我国第一所发展人才比较集中的、国际化的发展实践机构。期间, 中心的研究人员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发展系统、各双边发展援助机构, 以及国际NGO组织等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技术服务, 使中心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国际发展咨询的研究机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 中心的业务开始由国际发展咨询逐步扩展为国际发展教育和发展研究, 其发展教育的功能演化成为了我国第一所农村发展学院, 而后成为了今天的人文与发展学院。其国际发展的研究工作延续成为今天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职能。基于长期从事发展实践和发展教育的经验, 特别是对国际发展合作体系、运作模式、项目计划和监测评价等方面长期的实践, 更为重要的是, 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国际发展研究更加成为中国国际发展研究中重要的战略组成部分,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凭借其特有的实力, 致力于在中国对外发展合作的方式、政策, 中国的非洲发展研究, 以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国际发展研究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编 辑: 宋海燕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清华东路17号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民主楼

邮 编: 100083

电 话: 62737745

传 真: 62737725

E-mail: wangyanlei@cau.edu.cn

下载地址: <http://cohd.cau.edu.cn/main/>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